

# 托尼·莫里森《乐园》中的仪式与创伤叙事

徐 颖

**内容提要：**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乐园》，既渲染了代际之间的集体创伤记忆，又聚焦于族群中个体的创伤书写；既有对种族暴行所刻印的族群创伤的控诉，又有对性别压迫所引发的个人创伤的言说。仪式在小说的创伤叙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鲁比镇炭黑肤色男性将本族群被拒斥和驱逐的屈辱历程圣化为“复归福地仪式”，掩盖了集体创伤记忆；而修道院女子通过狂欢化仪式“大声说梦”、倾诉创伤，获得创伤记忆的疗愈。两个群体的创伤叙事又通过“逐巫/献祭仪式”发生关联。

**关键词：**《乐园》；创伤；仪式；疗愈

**作者简介：**徐颖，北京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19世纪英国小说和20世纪美国小说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际关系学院基本科研经费“新时代国家安全话语体系研究”（3262019T04）阶段性成果。

《乐园》（*Paradise*）、《宠儿》（*Beloved*）和《爵士乐》（*Jazz*）构成了非裔美国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历史三部曲”（History Trilogy），体现了莫里森梳理黑人族群历史与记忆的努力。三部小说中的黑人群体背负着苦难的创伤记忆，历史上的屈辱、集体的焦虑、个人的悲愤纠结在一起，融入困顿的现实生活中。《乐园》在三部曲中背景最为恢宏，小说中既渲染了代际之间的集体创伤记忆，又聚焦于族群中个体的创伤书写；既有对种族暴行所刻印的族群创伤的控诉，又有对性别压迫所引发的个人创伤的言说。

小说叙事的中心鲁比镇（Ruby），是孤悬于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的炭黑肤色黑人聚居的小镇，距之最近的建筑是十几英里外的一个女修道院。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在这两个并置的空间展开。两个社群平静的生活表象下隐藏着难以言说的个人与集体创伤。在他们相异的创伤叙事中，“仪式”（ritual）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仪式是建立族群意识和情感的方式，同时也为创伤受害者回溯言说历史记忆、疗愈创伤提供可能性。本文将以仪式为切入点来探究这两个群体对创伤记忆的再现与消解方式。

## 一、《乐园》中的个人创伤与集体创伤

创伤理论从19世纪末发端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范畴，并逐渐进入公共政治话语领域。陶家俊在《西方文论关键词：创伤》一文中追溯了创伤理论的发展过程，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到后弗洛伊德时期，又到后殖民创伤理论，再到创伤文化批判，本文对此不再赘述。美国社会学家凯·埃里克森（Kai Erickson）提出“个人创伤”（individual trauma）与“集体创伤”（collective trauma）两个概念：“个人创伤是对个人心理的一种突然打击，受害者的防御系统被这种巨大的打击力穿透，以致无法对其做出有效的回应；而集体创伤则是对社会生活基本肌理的打击，破坏了群体内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团结一致的情感（communality），这种创伤是缓慢作用的。”（Erickson, 1995）<sup>187</sup>

小说开篇时（1976年），鲁比镇独立而闭塞，有自己的银行、商店、学校和教堂，鲜少与外界交流；镇上黑人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夜不闭户，二十年间几乎无人故亡。然而在这安逸的表象下，危机若隐若现。小镇有九大家族，为首的是摩根（Morgan）家族第三代继承人——双胞胎兄弟迪肯（Deacon）和斯图尔德（Steward）。随着斯图尔德对家族百年历史的探究，其祖辈遭排斥、驱逐、压迫的“集体创伤”叙事陆续展开。情节回溯到南北战争后，这些炭黑肤色的黑人获得自由和工作机会，但在1875年的种族清洗中一切得而复失，他们沦为田间劳力后被迫举家西迁。一路上这些黑人历尽艰辛，不断受到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排挤，所到之处皆难立足。经过十几年颠沛流离的迁徙，他们终于找到乐土，建起“避难之所”——黑文镇（Haven），后又在黑文镇没落后建起鲁比镇。

如今这些黑人的后代在鲁比镇发迹，但这段背井离乡、求告无门的屈辱记忆却挥之不去。斯图尔德在回忆中深切体会到祖辈心中郁结的“远胜过怨恨的羞辱感”（Morrison, 1998）<sup>95</sup>——这些发誓保护妻儿的男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身怀六甲的妻子被扫地出门。一路上衣衫褴褛、衣食无着的黑人扶老携幼，赤足跋涉、草叶果腹、疲惫绝望到极点。白人将践踏在脚下的食物扔给他们；妻子难产得不到丝毫同情和救助，白人医院派兽医来给她们接生。种族主义施加于他们最刻骨铭心的创伤，是对其人之尊严的剥夺。

埃里克森认为集体创伤破坏群体内部原有的肌理和纽带，但悖论是，“创伤可以造就社群”——因苦难生成的“孤独感”和“疏离感”使创伤个体集聚起来，而经历了灾难后的社群成为“灾后乌托邦”（Erickson, 1995）<sup>185, 187, 189</sup>。两个世纪以来的被拒和失所，带给底层黑人精神创伤，破坏了他们原有的社群组织，却也使

其迅速抱团、相互支撑、构筑起新的“创伤群体”。但是这个“灾后乌托邦”却变为炭黑肤色黑人统治的狭隘王国：他们转而排挤曾经歧视他们的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甚至拒绝与其通婚。这种以黑人孤立主义为中心的新种族主义造成了新的创伤。于是，在炭黑肤色黑人掌握主流话语权的鲁比小镇，浅肤色黑人女性遭受种族和性别双重迫害，而成为最底层的“创伤群体”。

小说各章以受害女性命名。小说第一章“鲁比”，是摩根兄弟小妹妹的名字，因白人拒绝救治，她难产身亡，小镇以其命名是为了铭记这段创伤历史。第二章“玛维斯”（Mavis）是个终年忍受婚姻暴力的妻子，她误将双胞胎锁在车中使其窒息而亡。第三章“格蕾丝”（Grace）是叛逆不羁的黑人少女，她参与黑人暴动、目睹幼童身亡，后又因父亲和男友入狱而四处流浪。第四章“塞尼卡”（Seneca）从小被生母抛弃、后遭养母儿子等男性侵犯，只能通过自残来摆脱心灵创伤。第五章“迪万”（Divine）讲的是从小父母离异的帕拉斯（Pallas）遭其母和男友背叛，后又被人强暴怀孕后流落至修道院产子。讽刺的是，背叛帕拉斯的母亲“迪万”，名字意为“神圣或真爱”。第六章“帕特里夏”（Patricia）是鲁比镇的老师，她家三代人都因浅肤色而在镇上受到排挤和歧视。第七章“康索拉塔”（Consolata）年幼时在贫民窟里被人侵犯，后被修道院嬷嬷搭救至此，成年后与迪肯·摩根（Deacon Morgan）有段私情后被抛弃，她在嬷嬷去世后终日酗酒。第八章“洛内”（Lone）是鲁比镇的接生婆、一位边缘人物，她目睹着人们在创伤记忆中挣扎。最后一章“救救玛丽”（Save-Marie）是鲁比镇刚死去的畸形婴儿，以其名作为小说终曲，为创伤叙事嵌入救赎的味道。这九个章节是修道院收容女子的个人创伤的非线性叙事，其中插入了鲁比镇男性及其妻子的意识流回忆，再现了黑人族群的集体创伤，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个人与集体创伤复调交叠的立体叙事。

## 二、建国仪式与代际集体创伤的叠加

“集体创伤可能涉及代与代之间创伤经验的传递，如先辈以见证的方式将创伤的经历讲述给下一代，这种家族历史通过代际的交流，保存创伤的体验和认识，成为下一代身份构成和自我认知的重要部分……创伤经历者和分享者重述并重建一个共享的过去……这种对过去的重建和再表征的行为形成文化中的特殊的记忆过程。”（王欣，2012）仪式促成代际集体创伤记忆的传承与叠加。小说从斯图尔德·摩根的视角重述了其祖辈迁徙建镇的创伤历史。这段艰辛屈辱的历史，在讲述和聆听中构建为摩根家族几代人“共享的过去”，并在代际间的一次次表述和再

表述中变形为充满荣耀的神圣化“建国仪式”。

对于家族的创伤历史，斯图尔德了然于胸，却讳莫如深，他甚至禁止镇上年轻人称其祖父为“前奴隶”。他在聆听和复述家族史时有意凸显神圣化情节，隐匿被白人和浅肤色黑人拒斥、驱逐和受辱的细节。“面对巨大的精神损失，创伤受害者倾向于编造有力的故事和自我概念，由此找回自我感。”（朱云，2011）他们一次又一次讲述祖辈的故事，“危险的对峙、机智的规避。证明他们的坚忍、智慧、技巧和力量。交好运和愤怒的故事。可为什么没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可讲述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经历缄默不语。无话可说，就传递下去。仿佛往日的英雄荣光，足令他们过好未来的日子”（Morrison, 1998）<sup>161</sup>。这种具有欺骗性的神圣叙事压抑了集体创伤中的愤怒、无助和耻辱。

斯图尔德隐去祖父的原名“咖啡”（Coffee），而称他的化名“撒迦利亚”（Zechariah）。撒迦利亚是《圣经》中见证神迹的希伯来先知，曾劝服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在斯图尔德的记忆中，爷爷撒迦利亚虽然脚瘸，却带着79个逃难黑人沿着松林小溪向西北迤迳前行。一日，撒迦利亚领其子在松林中祈祷歌唱，林中出现神秘“行者”（the Walking man）。这行者身量矮小，脚步声却大如雷鸣，从最亮的天光里走来，只有撒迦利亚能看见他。行者或隐或现，或走或停，一路引导他们来到一片广阔的印第安营地。在这里，他们用劳作和谈判最终得到了“富饶的土地和无边的自由”。在仿拟“出埃及记”的神圣仪式里，撒迦利亚化身为受神迹指引的摩西（Hilfrich, 2006）。这个充满绝望和苦痛的逃难之旅，被美化为希伯来人出埃及、归福地的朝圣仪式。

这出埃及、归福地的隐喻，已融入美国清教徒“建国仪式”的叙述中。清教先父们辗转流离到这片新大陆，建立“山巅之城”，完成“复乐园”的宗教理想。《乐园》的中心情节纳入了这一仪式叙事线索——如同当年的清教先父们，这些被放逐的黑人在撒迦利亚的带领下，受神召至福地建起乌托邦乐园和山巅之城。这一“建国仪式”圣化了他们屈辱的历史，掩饰了族群创伤记忆，受排挤和迫害的底层黑人在仪式中化身为被荣光笼罩的“选民”。备受屈辱的苦难历史，因这神化的仪式而变得易于接受；而本该被深埋和忘却的创伤记忆，却因这选民意识而成为底层黑人引以为傲的光荣历史。

不断在族群间传扬讲述的神圣化仪式，不仅掩饰了炭黑肤色带来的耻辱，反而使炭黑肤色成为构筑种族优越性的基石。在鲁比镇繁盛起来的九大家族自诩为“圣室之家”，他们以自己的炭黑肤色为傲，将黑与白、炭黑与浅黑肤色所代表的等级关系反转，将白人和浅肤色黑人加诸其身的迫害抛掷回去。同时，他们还将

肤色作为道德评判的标准，认定炭黑黑人是高贵的、有美德的，而浅肤色黑人和白人是道德堕落的、淫荡的。他们对混血黑人的道德污名化，与当年白人对他们的迫害并无二致。鲁比镇以摩根兄弟为首的男性族长，坚定守护着炭黑黑人血统的纯正，禁止这些黑人与浅肤色黑人通婚，这个炭黑黑人的乌托邦乐园，俨然成为封闭、排外的孤岛。

为了使自己的选民地位更加合理，鲁比镇黑人还为“炉灶”（Oven）构建了圣坛般的地位。“炉灶”原本是在黑文镇建镇之初建造起来的，用以进行“洗礼”仪式，而非烹饪食物，它的实用性被象征性取代。后来，他们建鲁比镇又不辞辛苦地将“炉灶”搬运过来，然而随着小镇的繁荣，“炉灶”的神圣性被降格：“炉灶曾经目睹着洗礼者步入神圣的生活，而如今却沦落到看着这些懒惰后生的境地。”（Morrison, 1998）<sup>11</sup> 当年祖辈在炉灶上的铭文“当心他皱起眉毛”，即是撒迦利亚与上帝的“立约”——保持炭黑血统的纯正、永葆选民地位。

玛丽亚·鲁特（Maria Root）认为创伤具有叠加性，“创伤会通过故事代代相传……但这创伤会表现在后代人对特定环境的刺激反应中，因为这个人不仅有自己直接的创伤经历，而且还负载着前代人未克服的创伤”（Root, 1994）。仪式展演是创伤代际相传的方式，祖辈的集体创伤在仪式口述和展演过程中被传承、叠加到年轻一代身上。鲁比镇每年的圣诞剧演出，都会重演祖辈寻找福地“被拒”的历史。镇上小孩分别扮演“圣室之家”的七大家族，他们带着小娃娃，在跋涉之途向戴面具扮演的“白人”祈求食物，但是“白人”将食物踩在脚下践踏后扔给他们、让他们滚开。接着，“被拒斥的孕妻”在马厩生下圣婴、智者带来礼物的情节又在模仿新约福音叙事。族群创伤记忆由此被粉饰上荣耀感，然而基督降生所寓意的圣爱眷顾却没有进入观看展演仪式的黑人意识中。重复性的仪式展演年复一年地将被拒的创伤嵌入新一代黑人的意识中，与年轻黑人自身的创伤融合叠加。这加重了黑人们的焦虑和危机感，也催生了他们狭隘排外的宗教偏执。值得注意的是，每年的圣诞剧演出只有炭黑黑人参加，浅肤色黑人被排除在外。炭黑黑人将被拒的创伤加诸浅肤色黑人。他们扭曲的创伤叙事，不断强化炭黑黑人地位的优越感，在坚固族群凝聚力的同时，也为歧视和迫害浅肤色黑人提供了理论支撑。

“创伤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而代际间的幽灵——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的心理空间中重复表演，形成作为创伤间接承受者的后代自我心理的分裂——生活在熟悉、真实世界中的自我和生活在完全隔离、隐秘、陌生世界中陌生的自我。创伤寄生在下一代的心理空间中，导致自我身份

的紊乱和丧失。”（陶家俊，2011）<sup>117,120</sup> 鲁比镇的第三代黑人在展演祖辈神圣化仪式的过程中，无力形成完整的自我身份建构，他们的心理空间叠加和寄生的代际创伤很难被驱除，像“幽灵般”挥之不去。

### 三、献祭、狂欢仪式与创伤的疗愈

神圣化的历史重述虽暂时掩盖了创伤记忆带来的耻辱和不堪，却没有消减集体创伤，而是使创伤不断在代际间累积、重演、积聚。在创伤记忆最深处未得到释放的无助和痛苦，与仇恨纠结在一起于代际间扩散，而这些创伤带来的负面情感往往被转嫁到黑人女性身上。自诩为女性守护者的黑人男性，往往因目睹女性受难却无能为力而心生恐惧、绝望和愤怒，这威胁到他们对自己男性气概的认知，给他们造成深刻的心理创伤。于是，黑人男性会择选某些女性成为承载其创伤记忆的载体，将其作为替罪羊在暴力仪式中象征性献祭。小镇附近最符合异己标准的就是修道院中的边缘女性。

男性族长们将鲁比镇的衰败和堕落归咎于这些修道院女子，认定把她们献祭会带走小镇的厄运与不幸。他们对修道院女子施行了逐巫仪式。逐巫不啻以暴力手段规训异己，以转嫁社群累积的危机、排解无法纾缓的负面情感。小说以鲁比镇男性对修道院女性施加的暴力仪式开篇。他们荷枪实弹，在修道院里大肆屠戮。他们将浓雾包裹的修道院想象成脱离上帝管辖的罪恶之地，将修道院视作“反乌托邦的地狱”（王守仁等，1999）。他们在“炉灶”前谋划屠杀阴谋时，将修道院女子称作“巫婆”。连修道院平日卖给鲁比镇供不应求的辣椒，都被他们看作是“地狱之火”。迪肯将曾经的恋人康索拉塔想象成“长着绿色眼睛、善于诱惑男性、用酒来软化他的莎乐美（Salome）”，甚至认为她还诱惑了他的正牌妻子（Morrison, 1998）<sup>279-280</sup>。在屠杀的过程中“女巫”一词被多次提及：他们想象修道院是肮脏污秽的所在，里面的人是“毒物”，他们想象着太阳光照在草上“暴露出女巫的踪迹”，他们在女孩卧室里仿佛看见女巫的道具——写着邪恶信息的血字书信、占星图、十字架，他们在看着缎带上系着的一串童鞋和婴儿嚼环时，想象着这里可能出现的血和婴儿脚趾。他们说服自己“上帝在他们一边”，甚至将自己步行至此热气腾腾的样子想象成“夜间的正义”（Morrison, 1998）<sup>18</sup>。

这屠杀仪式并非如他们宣称的那样出于公义。这些男性之所以故意选择凌晨四时出发，在距修道院几英里远弃车步行，是因为需要黑夜、静寂和浓雾的掩护。在屠戮的过程中，他们眼前浮现出这些女子平日对他们的种种照顾。这个屠杀仪

式将修道院女性污名化为女巫，指斥这些女性“种族上不纯净”，所以他们先杀掉白人女子，可是小说一直到末尾都没有披露到底修道院中哪个女子是白人。作者在此章明确指出仇恨才是他们屠杀的真正动机，仇恨被比作黄油，“仇恨的纯油在表层，硬心肠在底部凝固”（Morrison, 1998）<sup>4</sup>。这一极端暴力仪式只不过是宗教之名施行的杀戮，是鲁比镇男性集体创伤叠加、压抑终至爆发的结果。

鲁比镇男性屠杀时一手执武器，一手举十字架。这个基督教仪式的重要象征，因耶稣的受难而具有普世救赎的意义。然而对于黑人来说，十字架在私刑仪式中的频繁出现，又使它被赋予悖论的读解，使其与黑人族群集体创伤记忆联系起来。小说中斯图尔德曾听祖父讲述 1920 年跑到私刑小镇的情景：“那个镇子北面立着‘黑人免进’的牌子，南面立着十字架，中间是无法无天的魔鬼。”（Morrison, 1998）<sup>154</sup> 之后对于斯图尔德，十字架便失去了爱与救赎之意、成为创伤的象征，频频与屠杀、残暴和掠夺联系在一起：“妓女乳沟间晃荡的十字架、绵延几英里的军人身上的铁十字、黑人院落里熊熊燃烧的十字架、职业杀手前臂上的十字架文身，还有那些在鲁比镇侮辱小女孩的白人汽车后视镜上吊着的十字架。”（Morrison, 1998）<sup>154</sup>

十字架成为承载集体创伤记忆的固着物。在种族暴力中曾经的受害者，如今成为施刑者。而施刑者与受害者的共通之处是“仇恨”。《乐园》中牧师密斯纳（Misner）就极为反感鲁比镇男性对边缘人群的暴力和加害，他清醒地意识到种族孤立主义的戕害和黑人暴力行为的恶果。在他眼中，鲁比镇是一个“美丽而孤绝”的社群，“孤立带来代际的灭亡，毫无未来可言”（Morrison, 1998）<sup>160, 210</sup>。而这些男性的逐巫仪式不过是仇恨的外显，“他们生于一种古老的仇恨，刚开始的时候，一种（浅肤色）黑人鄙视另一种（深黑）黑人，而后者使这仇恨升级，他们的自私、自负、错误和冷漠使头脑僵化，将二百年的苦难和胜利弃之如敝屣。鲁比镇不受圣经的约束，被其自身历史的咆哮震聋，已彻头彻尾的失败”（Morrison, 1998）<sup>306</sup>。

密斯纳牧师在摩根家族的继承人 K. D. 的婚礼上展演了一个献祭仪式。他扛起教堂的十字架，站在众人面前施行“圣礼仪式”、重演耶稣受难场景。这十字架——宗教仪式最震撼人心的标志，无言地诉说着人类的创伤记忆。牧师将这一标志阐释为“沉静地等待拥抱的直立人形”。十字架代表的是爱与公义，而非杀戮和仇恨。无爱的宗教会变成干瘪的空壳，被践踏和蹂躏者只能向当权者苦苦哀求，在荒野跋涉呐喊的弱者永远抵达不了福地，些许光明永陷黑暗。在莫里森的笔下，“这个孤独的黑人”仿佛受难的耶稣：

他毛茸茸的头昂起又在胸前垂下，他泛着光泽的夜色肌肤蒙上一层暗尘，画上了条条伤痕，被屎尿污得脏臭，在干燥的热风中变成白蜡，最后，随着阳光羞愧地黯淡，他的皮肉也随着午后光线奇特暗如黄昏地相应地昏黑了，在无常的天气中，吞没了他和其他死刑重犯，这一原罪的侧影则随着一个假象的夜空出现……上帝爱人类彼此相爱的方式，爱人类爱自己的方式，爱那十字架上的超凡人物，他爱人又自爱，在献出生命之时深深明了。(Morrison, 1998)<sup>146</sup>

作者将鲁比镇男性施行的杀戮仪式比作牺牲祭神的仪式：“耀目的黑夏娃们没有得到玛丽的拯救，如同受惊的母兽般，她们朝前跃向太阳，而太阳在烧尽晨霭时，将圣油洒向了猎物的后腿。”(Morrison, 1998)<sup>20</sup>这一描写突出了修道院女性的替罪羊形象，又与耶稣的献祭形象结合。倒叙手法使小说在接近结尾的地方与此处形成回环。小说中被塑造为女性耶稣形象的是修道院的康索拉塔。她的名字(Consolata)应和了安慰(console)之意。她一生孤苦，受到的唯一眷顾来自收养她的嬷嬷。在修道院里她无私地接纳一位又一位的逆旅人，使伤痕累累的女子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创伤集体”。康索拉塔拥有巫术奇能：她终日戴着墨镜，不能直视日光，却能在黑暗中视物清晰；她能迈进死人的身体，使人起死回生。

康索拉塔像基督耶稣一样收容有难甚至有罪者，使来自不同种族、阶级、地域的人得到发声的机会。她将修道院变成最好的治愈创伤的空间。这里没有等级威权、没有肤色政治、没有性别压榨、没有边界和利益关系。这里是完全平等、开放的空间。创伤理论学者朱迪斯·赫曼(Judith Herman)指出，“讲述骇人的创伤是恢复社会秩序和疗救受害个体的必由之路”(Herman, 1992)；苏珊·布瑞森(Susan Brison)亦称“见证创伤经历使受害个体得到自我感……融入群体”(Brison, 2002)，而社群对于有创伤记忆的受害者也是至关重要的。康索拉塔带领她们通过仪式化的讲述揭示并勇敢面对心灵和肉体创伤，形成一个参与对话、共同承担悲伤的创伤集体，从而获得疗愈。

小说中描写了康索拉塔引领的狂欢仪式。文本细致描写了她准备晚餐的过程，而这个备餐过程被切割，中间不断以第一人称叙事插入修道院每个女子对自己创伤故事的讲述。女子们一起制作和享用“最后的晚餐”，抛弃了彼此的嫌隙和不和，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晚餐之后，康索拉塔在修道院中主持了狂欢仪式。她们清洗地下室的石板地，使其干净得如同海边的石头，围上一圈蜡烛。她们每个人脱光衣服，以独特的姿势躺在石板地上，在烛光中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仪式



开始，康索拉塔讲述自己童年被伤害和脏污的身体、她和一个男人的肉体纠葛和嬷嬷玛丽·麦格纳（Mary Magna）对她的救赎。她鼓励女人们“灵肉合一”——“不要将灵魂、肉体分离，其中一个不能凌驾于另一个之上，夏娃是玛丽的母亲，玛丽是夏娃的女儿”（Morrison, 1998）<sup>263</sup>。她为女人们描述了天堂一样的地方。接下来她们开始了“大声说梦”（loud dreaming）仪式。“那些故事，破碎的半截故事，没出现在梦境里的事情都从她们的唇间飞出来，高翔于摇曳的烛光之上，使尘埃在箱箴瓶罐间飞舞。谁讲了故事、故事有没有意义都不重要。尽管她们的身体伤痛，她们轻易地步入了梦者的故事中。”（Morrison, 1998）<sup>264</sup> 她们在喧嚣的梦里讲出了心中压抑已久的痛苦回忆，每个人体验着其他人的悲伤，对别人的创伤感同身受。“爱的低语取代了指责”（同上）。此时康索拉塔变成了“新的女教长”，她用更清晰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乐园般的地方——海边白色的沙滩、艳丽的鱼儿在孩子身边嬉戏、蓝宝石般的果实味道甜美、男孩们的红宝石色子、纯金打造的教堂、围坐在一起的众神与会众、树一样高的康乃馨、有着钻石牙齿的侏儒、诗歌和铃声、只唱歌不说话的派拉德……

之后，修道院女子又在雨中舞蹈，将狂欢仪式推向高潮。这就像是她们自己独特的洗礼仪式。莫里森强调鲁比镇以北雨水带着香气，尤其是修道院香气尤重。修道院女子被这香气唤醒，她们在雨中狂欢，仰头接着如膏（balm）的雨水。此时作者联想到“世界上的那些大河”，暗指尼罗河，黑人女子仿佛摆脱了种族、性别、地狱的拘囿，释放自我，仿佛回到了精神家园。雨水驱散了她们存积心头的威胁与恐惧，“清洗”了污痕和痛苦的记忆。沉浸于灵魂洗礼仪式的众人，又听康索拉塔讲起乐园中的派拉德，“她将我放入如翡翠般的水中……她的歌声让海浪静止……牧羊人的肩头是彩色的小鸟，他们在歌声中回忆往昔……夜晚她从发间取出群星，将我裹入毛毯”（Morrison, 1998）<sup>284-285</sup>。

狂欢仪式之后的凌晨，这些得到疗愈和洗礼的修道院女子，仿佛复归正常平和的生活、沉浸在家庭的温暖中，她们一起准备早餐、迎接崭新的生活。这时，鲁比镇男性赶到修道院、展开了杀戮。小说由此与开头屠杀仪式呼应，完成了叙事的回环，这样也完成了整个“圣餐—祷告/倾诉—洗礼—替罪羊/基督献祭”的疗愈仪式。

小说最后一章，讲述了人们对鲁比镇男性在修道院中屠杀仪式的阐释，也交代了胜利逃亡的修道院女子的下落。这次屠杀献祭仪式不仅带给修道院女子创伤疗愈，而且也使鲁比镇男性发生了变化。迪肯·摩根开始反思，他赤足跑去与牧师米斯纳谈话，忏悔与康索拉塔的往事，也开始真诚面对祖父那段被隐藏的创伤

历史，讲述了那个被故意忘却的祖父的双胞胎兄弟。这标志着鲁比镇的封闭即将被打破，他们开始正视创伤历史中被掩埋的不堪细节，懂得只有宽广的包容和爱才是获得创伤疗愈和救赎的正途。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BRISON S J, 2002. *Aftermath: violence and the remaking of a self* [M]. Princeton: Princeton UP: 68.
- ERIKSON K, 1995.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 [M]//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Ed, Cathy Caruth.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P: 184-198.
- HERMAN J,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40.
- HILFRICH C, 2006. Anti-Exodus: countermemory, gender, race, and everyday life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J]. *Modern fiction studies*, (2): 323.
- MORRISON T, 1998. *Paradise* [M]. London: Chatto & Windus.
- ROOT M, 1996. Women of color and traumatic stress in 'domestic captivity': gender and race as disempowering statuses [M]// *Ethnocultural aspect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ssu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Eds, A. J. Marsella et al. Washington DC: APA: 374.
- 陶家俊, 2011. 西方文论关键词: 创伤 [J]. *外国文学*, (4): 117.
- 王守仁, 吴新云, 1999. 性别·种族·文化: 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创作(修订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79.
- 王欣, 2012. 文学中的创伤心理和创伤记忆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 (6): 146.
- 朱云, 2011. 疏离、记忆与倾诉: 解读《乐园》中的创伤之家 [J]. *当代外国文学*, (1): 21.